

巴蜀文化研究丛书
胡传淮 著

张问陶 年谱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胡传淮 著

张问陶年谱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问陶年谱/胡传淮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5.1

ISBN 7-80659-667-4

I. 张... II. 胡... III. 张问陶(1764~1814) -
年谱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331 号

张问陶年谱

胡传淮 著

责任编辑 谢艺波

封面设计 易 阳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4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667-4/K·107

定 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一

王英志

张问陶在清代乾嘉性灵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性灵派于乾隆时期以主将袁枚、副将赵翼为代表人物，那么于嘉庆年间则推张问陶为重镇，乃性灵派之殿军。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惟有张氏。其依据在于张问陶之才非其他一般性灵派诗人可比：一是张问陶有明确的性灵说诗学追求，其观点之完备程度直追袁、赵；二是张问陶诗歌创作成绩斐然，不仅继承了性灵派前辈袁、赵性灵诗之精髓，又因世运之衰败及自身独具的思想、个性而具有新的内容与特色，使性灵诗之价值有新的充分显示。在张问陶之后性灵派已走向衰亡，无人具备重振性灵派的力量，从而使张问陶成为乾嘉性灵派最后一位杰出的诗人，其殿军地位因此而确立。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张问陶重性灵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好鸟鸣春尚有情”，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

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自磨碎墨写天真”，“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笺注争奇”，以考据为诗。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血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具有刚正的气质与高尚的人格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另外，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愧我性灵终是我”，喜欢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到性。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是不难看出的。且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其差异实际上是对袁氏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

张问陶的抒情写景诗与其论诗所标举的诗学观点在美学思想上是大体同步的，基本上可视为性灵诗。故人评张氏“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这表现在张诗注重表现自己独具的个性气质、思想感情，给人别开生面的新内容、新意境。

关于张问陶的诗学成就，本人在《性灵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章有较全面、详细的论说，此处不再赘述了。

我现在想到的是在撰写《性灵派研究》和对张问陶诗学进行研究时，曾为找不到一部比较丰富、翔实的张问陶年谱而深感遗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张问陶作更深入的探讨。

研究古代文化名人应知人论世，年谱对于学术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都有后人撰写的年谱，幸运者甚至不止一种。但有的文化名人却很不幸，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无人为之编年谱。张问陶曾有人为之作“简谱”，似乎可谓“幸运”，但嫌单薄、简略，尚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张氏若地下有知，亦不会满足、欣慰，他会与许多有关学者一样，企盼一部全面、具体地反映其一生思想、创作的年谱问世。现在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因为胡传淮先生完成了《张问陶年谱》。至此，张问陶可以说是真正地幸运了。

胡传淮先生供职于四川省蓬溪县政协，蓬溪与张问陶故乡甚近，两地皆属遂宁市。这种地利条件使胡先生便于与张氏后裔接触，并广泛了解有关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胡先生于张问陶情有独钟，十余年坚持搜集、研究张问陶的资料，掌握了包括《遂宁张氏族谱》在内的大量珍贵资料。有这样的条件、基础，胡先生才编写出了一部内容丰厚的张问陶年谱。

此年谱十余万言，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了张问陶的世系以及张氏家族诗人等，使人对张问陶的家世有个整体把握。

第二部分为年谱正文，结合时代背景，按年月记载张问陶的

生平、爱好、交游及创作成就，重点介绍其诗作，系年编谱。

第三部分为附录。一是汇集正史、方志、诗话、族谱，及诗集中有关张问陶的资料，从中可了解他人或后人对张问陶的认识与评价。其中有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布。二是附录了《张问陶研究资料索引》，它既反映了国内外学界对张问陶研究的成果，又为学者进一步研究张问陶提供了信息。

此年谱体例完备，信息量大，又扎实严谨，其嘉惠士林是不言而喻的，而胡先生则可称之为张问陶的功臣。我与胡先生相知不长，且至今尚无缘谋面，但曾多次通信，切磋张问陶研究的有关问题，从中我颇受教益。通过来信，我能感觉到胡先生是一位热忱、执着、认真、严谨，决心献身学术事业的研究者，令我十分钦佩。现在《张问陶年谱》问世，可喜可贺。胡传淮先生的学术道路还长，他的下一步会有更大的成绩，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1999年4月20日于苏州大学凌云斋

序 二

朱则杰

四川胡传淮先生最近的一次惠函，告诉我其所著《张问陶年谱》一书，即将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因此嘱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

这话说起来很远。我得以结交传淮先生，始于1997年6月的首次通信。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书信往还一直没有中断过，并且还相当频繁。这些书信的内容，从我的角度来说，大抵都与《全清诗》有关。特别是在近年《全清诗》的对外联系工作上处于停顿状态的情况下，传淮先生的来信显得更加突出。即如今年头四个月，在《全清诗》统一编号的四封收函中，传淮先生就占了三封。而其具体的内容，则多半是应我的请求，赐教张问陶及其周边有关清代诗人的知识。

清代近三百年间，四川一省涌现过无数的诗人，张问陶尤其被公认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其实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张问陶的诗歌地位也是很高的。盖自明末清初开始，诗人们有鉴于

明代诗歌一味模仿汉魏盛唐特别是杜甫一家的教训，逐渐将取径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唐以前乃至宋元的诗歌，并且往往同时取法两家以上风格不尽相同的诗人，通过融会贯通，参合变化，进而形成自身的特色，由此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和流派。但是，清初的诗人无论怎样学习变化，他们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前代诗人的影子，受到前代诗人的束缚，这也就是后人时常批评的所谓依傍古人。因此，清代中叶被称为“乾隆三大家”或“江右三大家”的袁枚、赵翼、蒋士铨，以袁枚为主帅，提出了“性灵”说的理论，主张诗歌创作要自写性灵，绝去依傍，独立创新。这个观点获得了绝大多数诗人的赞同，从而使这以后的清代诗歌走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真正显示出自己的个性特征。并且从内容主题的角度来看，此时的诗歌也从清初诗歌的沉浸在民族矛盾之中，进而上升为反对封建，追求民主，力争整个社会的进步。张问陶的诗歌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际，其精神实质与袁枚等人正相一致，同样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进步倾向；并且由于张问陶生活的时代比袁枚等人稍后一些，因而在诗歌反对封建、追求民主的主题表现上，张问陶还更多地注意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在清代中叶的这场诗歌解放运动中，除了“乾隆三大家”以外，最突出的诗人恐怕就推张问陶了。当时以及后世的许多评论家，都每每将张问陶与“乾隆三大家”相提并论，联类为四；并且由于“乾隆三大家”中的蒋士铨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因此还有人甚至拟以张问陶取代蒋士铨，重新组成一个三大家集团。张问陶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难想见。

但是，正如整个清代诗歌一样，张问陶在今天也还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相比较而言，由于个人本身的成就，张问陶在清代总数可达十万家左右的众多诗人中，其在后世的研究还算是相当不错的。例如从本书有关附录可以知道，仅最近十余年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过张问陶的诗集《船山诗草》（船山其号），和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集一并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书目文献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过张问陶的诗歌选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出版过该校赵云中先生的专著《张问陶及其诗歌创作》；四川省遂宁市则专门成立了张船山研究会，编纂有《张船山研究资料集》，内部印行；此外各种专题论文以及介绍性文章，其为数就更多了。尽管如此，在张问陶研究上，仍然有许多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加强。即以年谱而论，根据来新夏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谢巍先生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等有关书籍介绍，虽然张问陶的年谱在近代、现代、当代分别都编写过一种，但或者是稿本，或者是刻本，或者夹印在杂志之中，一般读者很难读到，并且内容都过于简略，甚至还有的在谱主的生活年代上也并未完整。这，也正是传淮先生本书之所由作。

传淮先生长期在张问陶家乡即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的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担任《蓬溪文史资料》的主编。由于工作上的便利，尤其是主观上的努力，传淮先生在张问陶及其他相关人物的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方面，逐渐成就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专家，并且还同张氏的后人多有来往。这次传淮先生以其十数年之积聚，编撰为这部新的《张问陶年谱》，不但详细排比考订了张问陶的一生，而且以“谱前”的形式介绍了张问陶的世系和家族情况，又以“附录”的形式收集了许多稀见的张问陶研究资料，以

及历代研究张问陶的论文和著作目录索引。与此前的张问陶年谱相比，正可谓后出转精。它的学术价值，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当今学术著作出版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巴蜀书社能够毅然予以出版问世，使之成为迄今为止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张问陶年谱，这个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对张问陶研究，就是对整个清代诗歌的研究，无疑都是一件大好事。

1999年4月中旬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一	王英志 (1)
序二	朱则杰 (5)
谱前	(1)
一、张问陶世系	(1)
二、张氏家族诗人	(14)
年谱	(31)
附录	(171)
一、张问陶研究资料汇编	(171)
二、朝议公家书	(193)
三、朝议公行述	(195)
四、张问陶研究资料索引	(203)
再版后记	(210)

谱 前

一、张问陶世系

元明之际，由于战乱的原因，四川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经济萧条，文化板荡。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洪武初年，四川境内登记到的户籍仅八万多户，实际人口不满一百万。鉴于四川地区地广人稀，急待垦殖，明政府多次组织邻近四川的湖广（今湖北、湖南等地）移民入蜀，掀起了“湖广填四川”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发生在清初）。到洪武十四年（1381），四川人口猛增至一百四十多万，这对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湖广填四川”起于元末明初，并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可以说是一场历时四百多年的大移民运动，这在中国移民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说起自家的根，今天四川人总言必称“根在湖广麻城孝感乡”。

据《遂宁张氏族谱》（民国十三年刻本）记载：张船山的祖先原籍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明代洪武二年（1369），迁入四川省遂宁县黑柏沟，入川始祖为张万，至张船山，已历十三世。其世系为：

第一世

张万，原籍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白獭河之绿柳村。明洪武二年（1369）迁蜀，卜居遂宁县黑柏沟，卒葬黑柏沟大樟树湾。

清代《麻城县志》载，明初麻城县辖有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成化八年（1472），孝感乡并入仙居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的二十个里被划入新设置的黄安县（今红安县），孝感乡就改属黄安县了。因此，今湖北红安县的东南部即为明代麻城县孝感乡地。

黑柏沟位于遂宁东部，距遂宁城十余公里，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均为遂宁县所辖。因与蓬溪县接壤，1954年，黑柏沟始划归蓬溪县所辖。黑柏沟全长十余公里，分上下两沟。上沟大樟树湾和下沟两河口，均为张氏祖居地。两河口有张氏祖茔；大樟树湾有始祖祠。大樟树湾与两河口相距七公里，前者今属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五社大樟树湾，后者今属蓬溪县金桥乡翰林村两河口。两河口张氏祠堂现为金桥乡翰林村村委会驻地。清初名臣张鹏翮《大樟祖居》诗云：“柏沟樟树荫茅庐，始祖由来卜此居。三派辛勤躬稼穡，百年清白事诗书。宅心忠厚貽谋在，传世醇良积庆余。佑启后人培福德，莫忘高大耀门闾。”自注：“始祖万公初自楚迁蜀，兄弟三：一居铜梁，至大司马肖甫公（张佳胤）显；一居安岳，至侍御留孺公（张任学）显；一居遂邑，自景泰时姚安太守（张赞）至崇祯壬午，孝廉科第联绵。”（《张文端公

全集》卷五)。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七载有其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回故乡所作的《樟树湾祠堂月夜同寿门(张问莱)弟作》一诗,诗中有句云:“疏篱明夜火,老树立村名。”大樟树湾就是因湾内有一株高大古老的樟树而得名,其树古干虬枝,亭亭如盖,至今犹存。

关于遂宁张氏源流,除张鹏翮三派说外,另有一说,最早载于清代《池上草堂笔记》。清钱泳《履园丛话·报应》卷十六和近人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亦有载:张百龄有一日对客人说:“我本汉军张姓,先世系江西人。自元以来,积德累世,人无知者。某公精堪舆,尝卜一地,葬其先人。葬毕叹曰:‘吾子孙如不坠先业,后必出三公。’……葬后生子五人,分居五处:其一处湖广,后生江陵相国居正,谥文忠;其一处四川,入本朝,生遂宁相国鹏翮,谥文端;其一居江南,生京江相国玉书,谥文贞;其一居安徽,生桐城两相国,英谥文端,子廷玉谥文和;其一居长白山,入汉军,即吾先代也。”张百龄于嘉庆十八年,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谥文勉。合计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张居正、张鹏翮、张玉书、张英、张廷玉、张百龄),今尚科甲蝉联,卿贰接踵[转引自光绪丁未(1907)年所纂《张氏宗谱》中卷第三十八至四十一页]。张氏一支五房出六宰相,风光占尽,有清一代,鲜与伦比。

张万卒后,葬大樟树湾观音寨山中麓,其墓今存,人称“始祖墓”。墓碑为素面小碑,纵2米,横0.8米,厚0.3米,碑面文字大多剥蚀,今仅存“始祖张公讳万之墓”等字。清康熙末年,张鹏翮在京师曾多次给家人写信云:“闻黑柏沟世产,被楚人侵占。十里周围之田地,虽难以尽复,然祖茔之山前后及大

湾，祖基两河口交汇处，二地田地关系风水，断不可轻失”；“黑柏沟有始祖墓，尚未有祠，须令懋德（张鹏翮侄子）兼看，以防楚人侵占”。清初大批移民入川，形成“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高潮，张鹏翮时任户部尚书，老家田产祖茔还被湖广来的移民侵占，无计可施。可见其廉洁正直，不恃势压人。后来清还，张鹏翮作有《黑柏沟祖茔被楚民侵占，蒙制军清还，读罢檄语，感而泣下》一诗，诗中有句云：“日暮秋风生万壑，几回衫袖掩啼痕。”

第二世

张永成，张万长子，赐封承德郎、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娶余氏。卒葬遂宁土桥铺（今遂宁市安居区聚贤乡）鹰嘴山。

第三世

张赞，永成子，字邦翊，号靖翁，生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十一月十四日。景泰四年（1453）举人，五年（1454）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天顺八年（1464）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惠政卓著，吏民称歌。《云南通志》《姚安县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有载。娶王氏，子二人、女一人。卒于弘治二年（1489）三月，葬遂宁土桥铺凤凰窝，崇祀名宦祠、乡贤祠。《遂宁县志》有传。

第四世

张福暉，张赞子，隐居不仕。

第五世

张尚威，福暉子，处士，娶吕氏，为张鹏翮之高祖。卒葬黑柏沟，其墓今存。墓碑纵2.9米，横4.6米，厚0.6米。墓碑主文为“明处士高祖考张尚威之墓”。清代张邦伸撰《锦里新编》

卷二载：“文端公（张鹏翮）高祖葬遂宁黑柏沟，山势雄峻，落穴端平，惟元神水直出，不能百步转澜，形家以为贵而不富。张氏自文端公后，科甲连绵四五世；至船山（张问陶），官阶俱至府道以上……累世皆以清节著，家无余赀，彼形家风水之说，诚非无因矣。”（载《锦里新编》上册第十一页，1984年巴蜀书社版）

第六世

张惠，尚威长子，字教庵，隐居不仕，积善好施。生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二月初二日，配孟氏，子五人。卒于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十八日，享年九十七岁，学者私谥“三多先生”，葬祖茔两河口。清康熙时状元、礼部尚书韩葵撰有《教庵公传》，载于民国本《遂宁县志》卷五和《遂宁张氏族谱》卷二。其墓今存，位于蓬溪县金桥乡翰林村两河口南纱帽山中麓，墓碑纵2.8米，横0.95米，厚0.4米，碑文完好。

第七世

张应礼，张惠次子，字和斋。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三月十六日，娶周氏，子九人。官怀远将军都司佾书。卒于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十二日，与张惠合葬于两河口，其墓今存。

第八世

张烺，张应礼第四子，字冲寰，号松龄。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五月二十三日，卒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月初二日，享年89岁。配景氏，侧室季氏。子六人：鹏翮、鹏翼、鹏举、鹏飞、鹏翥、鹏搏；女二人。景太夫人为张鹏翮生母，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初葬遂宁城北玉堂山，后迁葬祖茔两河口。清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熊赐履撰